

17.21

2012.12.26



第 二 卷 (上)

纪念伟大、光荣、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

目 录

武汉建党初期的回忆.....	李伯刚 (1)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武汉早期的传播.....	曹宪林 (7)
董老早期在武汉的革命活动片断.....	余义明 (12)
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	程子华 (24)
忆武昌中央农讲所的学习.....	涂国林 (27)
崇实中学和吴德峰同志.....	费佩如 (32)
我的父亲李汉俊.....	李声簧 (35)
大革命时代的武汉所见所闻.....	杨玉培 (42)
陈潭秋烈士在武汉.....	吴白狐 (57)
陈潭秋、毛泽民烈士 被蒋介石、盛世才勾结谋杀的内幕.....	郑大纯 (67)
碧血千秋照湘江 ——记何功伟烈士在鄂西.....	闻一尧 (77)
我是怎样亲手埋葬何功伟烈士的.....	刘裕松 (111)

新四军五师千员伤病员北上记·····	袁 文 (119)
难忘的一次“飞行集会”·····	李守宪 (126)
“六一惨案”纪实·····	吴煜令 (129)
疑云迷雾中的汉口《星报》《晨报》·····	关锡庚 (148)
在武汉警察界里的战斗·····	陈叔一 (157)

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回胜利

——回忆收回汉口英租界·····	周何亮 (161)
汉口英租界的英帝罪行·····	李绍依 (164)

汉口水电事业的由来和演变

——记汉口既济水电公司·····	贺衍夫 梁绍栋 (181)
武汉第一家华商打包公司的回顾·····	刘笃生 (191)

小资料

中共五大·····	(6)
八七会议·····	(110)
《向导》报·····	(76)
宁汉合流·····	(160)

我是怎样亲手迫害何功伟烈士的

刘 裕 绥

一、郑新民叛变供出线索 二、在辛湾医院施虐折磨 三、越狱区无人
拦路追捕 四、又一次行动再捉三人 五、何功伟烈士狱中牺牲 六、刘玉
清烈士同盟惨杀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前后，恩施——鄂西一带掀起一股疯狂的反共高潮。这时，正是宜昌沦陷之后，陈诚率至恩施，充当了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是以反共起家的法西斯头目；当他一到恩施，那里的特务组织和反共活动，便纷纷建立、猖獗起来。

恩施当时的特务组织，除了陈诚自成体系的特务机构——“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研究室”，还有名义上属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中统“湖北省调查统计室”，打着湖北省政府保安处第四科（简称“保四科”）招牌的军统“湖北站”；同时又有对外以“军令部驻第六战区高级联络参谋室”名义为掩护的军统“军事谍报流动组”，由军统高干刘培初任少将“室”主任兼组长，驻地在恩施城内鼓楼街十六号。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室”（组）当少校参谋。

一九四〇年冬，刘培初向陈诚建议，将恩施所有特务组织集中起来，统一领导，共同对付共产党。经陈诚批准，当即成立了一个名为“恩施高干会”的首脑机构；恩施的省一级的党、团、军、政、特头目均参加为“高干”，由陈诚兼任主任高干。“高干会”下还有一个“干事会”，由刘培初兼主任干事，阎夏阳

(军令部高级联络参谋室上校高参)兼秘书,掌握实际工作。

恩施高干会的成立,是恩施及鄂西一带反共活动推向高潮的标志。曾在武汉领导“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何功伟烈士,就是在这个时期壮烈牺牲的。

郑新民叛变供出线索

何功伟烈士的牺牲,起源于叛徒的出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约在春节除夕前三、五天晚上,阎夏阳把我和军统“湖北站”一个姓王的(人称“王大个”)特务人员叫去,指示我们:“清江中学教导主任郑新民,是个大共产党。今晚你们去抓来;切莫惊动让他逃走了。”

我们奉命后,当天深夜三点多钟赶到清江中学,对门房人员诡称我们是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派下乡来采购木炭的,因天冷夜深,又将降雪,想在学校里暂歇一下,天明就走。于是门房通过庶务员,把该校校长朱绚雅喊来与我们见面。朱校长把我们引到校政厅,生火招待。姓王的问朱校长:“贵校教导主任郑新民在学校吗?”朱说:“在学校。你认识他吗?”姓王的又说:“不认识。因为有个朋友有封信交我带给他。”朱校长表示可以去喊郑新民来见面;姓王的则说:“等天亮以后,我们一道去看他。”

天色黎明,朱校长把我们带到郑新民的家门口,喊门时,姓王的才对朱校长说明“我们是来逮捕郑新民的”。一进门,姓王的将郑新民监视起来,我就进入内房检查;只见郑的妻子正在给两个小孩穿衣下床,什么东西也没有检查出来;只得叫朱校长派一名校工挑着郑新民的行李,带着郑新民的妻儿一同进城,向阎夏阳交案。

阎夏阳将郑新民与他的妻儿隔离关押,并亲自审理。阎夏阳首先对郑的妻子做了许多威胁利诱工作,并让郑新民和他的妻子当面商谈;约两个星期,郑新民就“自首”了。除了亲自回到清

江中学取来了他收藏的一些书籍外，并交出了鄂西地下党组织的许多线索，致使中共鄂西特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何功伟烈士亦因此被其贩卖牺牲。郑新民因而就在“恩施高干会”当了中校“审讯专员”。

在羊湾医院诡秘侦察

一九四一年年底的一天，阎夏阳交给我一个侦捕任务。他告诉我：“据郑新民说，有个女的，名叫刘玉清（即一清），四川口音，中等身材，穿着朴素，年龄约二十四岁左右，西南联大学生，三个星期前在羊湾医院生小孩。她是个大共产党。现在命令你去侦察，务必要逮捕归案。”并嘱咐说：“羊湾医院是外国人办的，千万不能发生冲突，以免引起外交纠纷。”

第二天上午，我穿着棉长袍，化装成大学生模样，去到羊湾医院，直接走进产妇病室。护士问我找哪一个？我说“我是从重庆来的。因为学校放了寒假，我母亲叫我特地来看我姐姐的。”护士问明我说的“姐姐”名叫刘玉清后，她想了一下回答说“没有这个人。”我马上装出十分难过的神情，用一套母女和姐弟骨肉的感语打动了这位护士，她把我引到会客室，即时找来几位护士，向她们打听，都说没有此人。经我一再要求，有位姓张的护士热情地把我带到医院办公室，让我等在门外，她独自进去查找产妇底册。不一会，她出来对我说：“有一个刘玉清。她在三个星期以前已经出院了。”

我听到这话虽然很高兴，但又想到“下一步怎么办？”这时，我看到张护士的一副同情的样子，念头一转，又装出失望的痛苦表情，把她请到院子里，除了假意向她表示感谢的好感外，进一步向她打听刘玉清出院时的情况，她说不知道。我要求她一同回到会客室，护士们都围了上来，听她说完查找底册的情况后，突然有个护士说：“记得是有这个人，她出院时，有个男的来接，

帮他挟着铺盖，从后门走的。”我接着问：“有没有滑竿（即轿子）来接？”那位护士说“没有看到”。我只得自言自语地埋怨“姐夫太忍心了，姐姐也太苦了。”向护士们再次道谢，离开了医院。我边走边想，如有滑竿来接产妇，必定远去，如无滑竿，可能就在附近。所以从医院后门顺着山坡小道侦察，在一间破烂土屋里，找到一个老年妇女，先问她附近有无刚从医院出来的产妇，她说没有。也没有看到滑竿。

当我回到“高干会”后，琢磨着：刘玉清生了小孩，不满月就出院，为了产妇和小孩的安全，很可能有人来医院取药。因此，第二天早晨，我带着糖果和桔子，借口向护士们道谢，再次去到羊湾医院。

在医院会客室里，护士们吃糖果、开玩笑，闹了一阵，我趁机问她们：“我姐姐未满月就出院了，身体还没有复原，难道没有人来拿药吗？”有一位护士连忙说“有的。还是那个接你姐姐出院的人。”我装着很高兴地说：“谢天谢地，谢谢各位，我们姐弟总算有机会见面了。”同时我又编造了一套假情况欺骗她们，说“拿药的人就是我的姐夫。他的学问很好，我姐姐因此就爱上了他。但是我爸爸不赞成。所以我姐姐书也不读了，跟我姐夫同居了。我母亲非常想念我姐姐，又知道她在生小孩，就瞒着我爸爸，叫我赶紧下来看姐姐。”为了防止护士们泄露风声，我对她们说：“我姐夫性情很高傲，对我家的人都不满，如果知道我来探望姐姐，他一定药都不拿了。所以我姐夫再来拿药时，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我来了。”护士们信以为真，都同意为我“保密”。并告诉我，我“姐夫”拿药没有一定时间，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隔一天，有时隔几天……。

趁山区无人拦路逮捕

第三天上午，我又到了羊湾医院。约十点左右，空袭警报响

了，我随同张护士躲进医院的防空洞。不一会，突然药房的一位女护士匆忙跑来对我说：“你姐夫来拿药了！”我问：“惊动他没有？”她说“没有”。接着我和张护士随她一同走到药房外面的一棵腊梅树后，药房护士暗地指明“取药人”让我看清楚了，我装着与张护士“谈爱”的神情，避免“取药人”对我的注意。等到“取药人”离开药房走出后院，我故意哼哼唱唱地跟了出去，盯在后面，在一条西到土桥坝、东去上官坡、有一栋小住屋的岔路处，“取药人”看不见了。我于是跑上路南高地观察，四面都无踪影，所以我断定“取药人”必然进入了这栋住屋。

这时，我认为侦破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必须立即行动。但又想到，对象起码有二人以上，我独自一人，而且周围环境陌生，难于下手，只好赶往离此约半华里的上官坡，找人协助。路上，刚好碰见两个人，是佩有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符号的木工和伙伕。我掏出手枪和秘密工作证，迫使他二人随我回到看得见岔路旁那栋独屋不远的地方，命他们一在屋前、一在屋后约一百公尺处瞭望。约二十分钟后，木工跑来报信，我一看，正是取药的那个人，他正朝着上官坡方向走去。当他走到离屋较远、屋内的人看不见的地方，我赶上前去将他拦住，掏出手枪说要将他逮捕；他问我为什么要逮捕他，我说“就是要逮捕你！”他又问：“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就是要逮捕你！”他见我蛮不讲理，再也不说话了。就这样，我把他带着绕道进城，关押在鼓楼街十六号。

阎夏阳听了我的汇报，立即带着郑新民去辨认，我也跟在一道。郑看过一眼后很快退出，在天井里对阎夏阳说：“他就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何功伟！”

又一行动再捉三人

紧接着又是一次逮捕行动。

阎夏阳听说捕到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何功伟”，意外高兴，迫不及待地派军统湖北站特务夏廉作为我的助手，带着七、八个便衣，马上赶到何功伟进出过的那栋住屋。一进门，堂屋里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产妇正在摇着“摇窝”，大家蜂拥而上将她逮捕。产妇极力挣扎，操着黄陂口音大叫：“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大白天里无故抓人？！”这时，一个老年妇人从内房跑出来，与我们撕扯；并说他的儿子是军官学校毕业，现在县政府做事，中午还要回来吃饭的，……。一手把我拉进房内，从墙壁上取下一张“中央军委特别训练班第六期毕业全体合影”的照片，指着其中一个说：“这就是我的儿子！”

我想，这产妇与刘玉清“四川人”的口音显然不同，也不象个大学生样子，时间已到中午，索性等她男人回来再说。果然产妇的丈夫回来了，看见这个情景，也莫名其妙。我把逮捕产妇的原因对他说明，他笑着说：“你们搞错了。”并指着牛棚旁边的一间房子说：“那间房里，三个星期前接生一户从医院出来的产妇。但是我们没有同她讲过话。”我们听了，又一窝蜂涌向牛棚，这间房内上了门，我们喊门不开，便用力乱撞；一会，一个产妇抱着婴儿把门打开，转身坐到藤椅上。这时，只见火炉里还有未烧烬的纸灰，我断定她是刘玉清无疑，什么话也不对她说。大家在房内大肆搜查，结果仅仅抄到了三本书——《死魂灵》、《唯物辩证法》和张仲实译的《资本论》；其他则一无所获。

我叫随来的几名特务将刘玉清母女和行李押送进城，夏廉随同我仍然留在这里“守鸽笼”（即守候逮捕）。下午三时许，黄陂口音的产妇来告诉我们，这栋住屋的房东来了。我一前一后叫夏廉蒙头睡在床上，冒充刘玉清生病，一面询问房东谁是这间住房的介绍人？房东说是山下的一位张先生介绍的。我诡称自己是刘玉清的弟弟，因姐姐生病不能起床，想请房东去把张先生找来，有要事同他商量，……。正说到这里，夏廉猛然掀开被子，骗局戳

穿了，我索性把房东带到屋外，出枪威胁，叫他下山对“张先生”说，“刘先生”有要紧事，请他赶快上山。房东怕我杀他，只好前去了。过一会，房东急忙赶回来对我说“张先生家里有客，叫他太太先来了。”于是我和夏廉跟房东同到山路边守候；经房东辨认，当场将张太太逮捕，由夏廉带走。我又叫房东带路，直接去到张先生家里，张先生正在与咸丰初中校长柳某谈话；这时我才知道张先生名叫张冀，是湖北农学院讲师，我当时给张冀的两个儿子将他逮捕，押回“高干会”，随后关在军统湖北驻恩施办事处（恩施城内西大街，挂的招牌是“财政部湖北缉私处”）。据主办审讯材料的特务杨鹤告诉我，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曾亲自审讯，但张冀坚贞不屈，只承认他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与何功伟同乡。至于张冀夫妇以后的去向，我就知道了。

何功伟烈士狱中辗转

何功伟被我逮捕到鼓楼街十六号后，不久就转到恩施南门外浅水塘“高干会”看守所，由号称“活阎王”的何夏阳直接审讯。据参与审讯的杨冀透露：在审讯过程中，何功伟一直保持处之泰然的态度，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何夏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他的答复是：“既然你已经知道，何必问我？”顶得何夏阳哑口无言。刘培初、朱若愚曾多次找他谈话，使尽了种种威胁利诱手法，何功伟仍然不予理睬。因此，刘培初根据陈诚、朱怀冰（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高干会”副主任高干）的意图，主张将何功伟长期软禁，感化后加以利用，并派专人到何功伟咸宁家乡，通过沦陷区，把何功伟的父亲接到恩施，企图以父子之情打动何功伟，结果出乎意料，何功伟不仅不为所动于衷，还写了一封绝命书给他父亲，表达了壮志不移的决心。所以他父亲也只好同儿子洒泪而别，回到家乡去了。

何功伟烈士确切的牺牲时间我不清楚，仅知大约是在一九四

一年冬天。因为，一九四一年五月，“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成立，原“军令部驻第六战区高级联络参谋室”全体成员都转到“党政总队”任职，我从此就在党政总队第二科（情报科）当少校参谋；同年八月，我调往四川黔江工作。“恩施高干会”亦于此时改组为“民训会”了。一九四二年二月，我从黔江调回恩施，这才知道何功伟烈士已经牺牲。据党政总队二科中校秘书（后任浅水塘看守所所长）马汉云告诉我：阎夏阳（这时是党政总队第二科上校科长）趁刘培初（这时任党政总队少将总队长）赴前方视察未归，一天晚上，命吴子田（阎夏阳的卫士）以陪伴何功伟散步为名，从何功伟身后连发三枪，将何功伟打死在浅水塘看守所外面的田野上。

刘玉清烈士同遭惨杀

刘玉清烈士一直是关在距恩施城区约二十华里的长沙田——军统湖北站看守所的。也是因为她始终不肯叛党，就在何功伟牺牲前后，被湖北站站长朱若愚派人将她秘密杀死。她的女儿，因为浅水塘看守所中校所长周德润夫妇没有子女，而被周的妻子收养。另据郑新民说：刘玉清的丈夫名叫尹肇基，是“中共湖北省组织部长”，在刘玉清被捕前的一个月前已经撤离恩施，去了重庆。

以上所写，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从而如实地供述了何功伟、刘玉清二烈士是我亲手逮捕，以致惨遭杀害的过程。回忆自己当时在鄂西反共高潮中的所作所为，的确罪恶斑斑，罪行累累。读者阅后，想必亦皆毛骨耸然，义愤万分。自己虽获党的宽赦，而愧疚心情，至今耿耿未平。但历史客观存在，必须还原真实，故坦率直陈，以此作为揭露国民党特务政治黑暗凶残的一个侧影，并藉此表达自己莫吊烈士忠魂的悼别之情。敬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新四军五师千员伤病员北上记

袁 文

英 明 决 策

一九四六年五月，北运新四军五师伤病员一千名，这是特殊形势下的一项英明决策，是党中央派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美国和我党参加的三方代表“汉口会议”上力争得来的。

我当时是五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任中原军区二纵组织部长），直接担负了这一光荣任务。

早在抗日时期，新四军五师活跃在湖北、安徽、湖南、河南等省的边界，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调兵遣将，以“受降”为名，闯进鄂豫皖边区，抢占了平汉、粤汉、长江、汉水等交通干线和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的广大农村，我五师被迫撤至桐柏山区。党中央为了增强五师实力，遂令王震率豫西军区部队南下，令王震率湘鄂赣南下支队——八路军三五九旅由湖南北上。在桐柏山区，这两支部队与五师会合，组建了党中央中原局，并将鄂豫边区部队改为中原军区。李先念同志任司令员。

蒋介石看到中原我军实力越搞越大，匆忙从各地紧急调遣了大批部队，企图赶往桐柏山区，妄图吃掉我军主力。

当时，全国各解放区都给蒋介石的疯狂进攻以沉重打击；加之全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越来越

越高，因此，蒋介石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不得不签订了“停战协议”。

接着，美国派遣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以“和平使者”的身份，装腔作势，邀约国、共代表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并派出了许多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分赴各地进行军事“调处”。这实质上是美蒋合谋的一个缓兵之计，在“军调处”的掩护下，以加强发动内战的准备。

五月七日，我党首席代表周恩来同志、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徐永昌抵达武汉；五月八日，各率领随从多人以及各报社记者共四十余人，由武汉乘专车来到中原军区所在地——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徐永昌未去，由第六战区副参谋长王天鸣代）。

在三方代表谈判会上，李先念司令员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军队进犯我中原军区，破坏停战协定，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使国民党代表低头不语，狼狽不堪。

五月九日，三方代表返回武汉。十日，在汉口杨森花园（现中共武汉市委印刷厂院内）继续谈判。由于周副主席正义在胸，据理力争，终于达成了《汉口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同意中原军区伤病员与眷属及照顾伤病员的医护人员共一千名，乘火车北上，运送到安阳转晋冀鲁豫解放区。”

接受任务

《汉口协议》签订后，李先念司令员即时主持召开了护送伤病员北上的会议。在会上，他详尽地分析了形势和具体布置了这一光荣任务。他说：“现在情况很危急，国民党要消灭我们的决心早已下定了，我们突围的决心也下定了。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保存干部，在部队突围前，队伍要精干。周副主席已与国民党、美国代表达成‘协议’，同意我们护送伤病员一千人到解放区。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协议，把干部保存下来。”李先念同志对我

说：“你与刘型（政治部主任）同志坐飞机回延安的事，我没有同意呀。现在要派你护送伤病员乘火车北上。你把这些同志带到邯郸，交给党中央西北局。你过去在一二九师担任过组织部副部长，那里上下你都很熟悉”。先念同志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一下，又诙谐地说：“北上要经过国民党占领的地区，你害怕吗？”我笑了笑，说：“革命嘛怕什么呀。党交给我的任务，保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先念同志又说：“就是一个干部，一兵一卒，也不许你丢掉。”我说：“宁可牺牲自己，决不丢掉一个同志。”先念同志高兴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交待了注意的问题。我们与国民党谈判中，决定北上的人三不准带：一不准带枪支，二不准带弹药，三不准带金银。为了确保安全，避免发生意外，决定一律不带组织关系。在到达目的地后，组织关系用电报联系恢复。先念同志还叫我以卫生部副部长的身份带队护送，戴上个“上校”军阶的领章。

这次北运伤病员是合法的。我们利用了这个机会，安排了重伤病员转移，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健康的干部，扮成伤病员，撤退到老解放区去，以保存这部分革命的宝贵财富。为了保证五师北运伤病员的顺利进行，组成了由三方代表参加的护送小组。我方代表是郑绍文、薛子贞二同志。

北运伤病员，以平汉铁路为轴线，分别在两个地区集合。一在平汉路东的大悟县冯王城，一在平汉路西的应城县徐家棚子。我被分配在铁路西集合点工作。

五月十二日，我提前来到集合点。接着，伤病员陆续到达。我即组织民佚用担架抬着重伤病员，轻伤病员拄着拐杖，或骑着牲口，有的家属背着简单的行李，有的抱着小孩，朝王家店车站进发。我们到达王家店车站后，站上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们。一个佩戴少尉军阶的国民党军官，态度傲慢地向我敬了个军礼，当他发现我戴着上校肩章时，又急忙向我报告说：上

车地点，奉命已改在广水车站。我听后觉得有点不大对头，马上与我方代表薛子贞同志通了电话。当我确信改变了上车地点后，严肃地对那个国民党少尉说：“到广水车站的沿线都是你们的哨兵，一路上，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出了问题，由你们负全部责任。”

正在这时，突然又跑来一个国民党上尉军官，向我说：“报告上校，这一路，都是兄弟的部队；我保证贵军安全通过，我已派人前去招呼，请上校放心。”我见他态度真挚热情，便伸出手去，向他道了谢。

王家店距广水仅一站路，我立即决定沿铁路线快速前进，沿途国民党哨兵确未再找什么麻烦。于是我对那个国民党上尉军官发生了好感，我意识到这个人或许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至少也是同情革命的进步分子。

接近广水车站，要通过一座桥，桥两头都有国民党哨兵，当我通过时，顿时使我紧张起来；我发现站在桥头的这个哨兵，是我师政治部卫生连的一个战士，因为害怕艰苦生活，开了小差，到国民党部队中当了兵，我认识他，他也了解我，如果他暴露了我的身份，岂不又是麻烦。我横下一条心，昂首阔步地从他前面走过去，而且两眼死盯住他。他显得有点不自然，向我敬了个礼，我朝他挥了一下手臂，示意他不要讲话。他还知趣，没有吭声，我见他红着脸，低下了头。

乘 车 北 上

我们安全到达了广水车站。

不出所料，车站上如临大敌。国民党军队在车站周围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他们强迫我军重伤病员一律躺在铁路两旁的低洼潮湿的地方，把轻伤病员和家属们层层包围起来，形如在押囚犯。

车站周围的群众，看见我们这一批穿灰布军衣的新四军部队，高兴地议论着；但是一个国民党军官却向群众吼道：“走开，这些俘虏兵有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这对我们是莫大的侮辱，有一个同志理直气壮地冲着那个家伙骂道：“放你妈的屁……”并转身向群众大声地说：“我们是新四军的伤病员，经过与国民党交涉，达成协议，由这里乘火车去北方老解放区治病养伤的。”群众听到后，有的亲切地向我们打招呼，那个国民党军官碰了一鼻子灰，气急败坏，指挥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把周围的群众赶跑了。

上午十时许，国民党开始“检查”。根据“军调处”三人执行小组的规定；只有执行小组的成员才有资格检查。而国民党反动派竟要派他们的部队来“检查”。我据理反驳，拒绝“检查”。国民党无奈，只好叫他们的代表来检查。

最难办的是那些病号，特别是伪装成病员的干部。国民党代表说：“他没有病”。

我断定那个代表并非医务人员，便和他吵了起来：“我是卫生部长，我还不了解我们的伤病员吗？你不懂医术，胡说什么？”

我军代表薛子贞和郑绍文二同志在背后支持我吵。等我和国民党代表吵的很凶时，他们又装着“调处”的样子：“好啦，好啦，不吵了，不吵了，好好检查嘛。”

美国代表见我大发脾气，把那个国民党代表气得脸色象猪肝，也来“调处”说：“有病，有病，去，去！”

紧接着是“政治检查”和“心理测验”。国民党军官逐一地问我们的伤病员：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自愿参加新四军？到华北去做什么？这样折腾了半天，竟说有一百多人“不合要求”而不准上车。

我大发脾气，质问他们这叫做什么检查？这样搞完全是破坏